

BJWICKYC
国际问题参考译丛

PETER J. KATZENSTEIN

[美]彼得·J.卡赞斯坦 著

文化规范 与 国家安全

Police and Military in Postwar Japan

——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

CULTURAL NORMS &
NATIONAL SECURITY

新 华 出 版 社

国际问题参考译丛

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

——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

[美] 彼得·J. 卡赞斯坦 著
李小华 译

新 藏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 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 / (美) 卡赞斯坦著; 李小华译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1

(国际问题参考译丛)

ISBN 7-5011-5485-6

I. 文… II. ①卡…②李… III. 文化-关系-国家安全-研究-日本 IV. D731.3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7396 号

北京版权局外国图书合同登记号 01-2001-2217

Cultural Norms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e and Military in Postwar Japan

Copyright © 1996 by Cornell University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1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

——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

[美] 彼得·J. 卡赞斯坦 著

李小华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25 印张 201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5485-6/D·885 定价: 18.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10-65895562 65897685)

代引言 学会用多视角看问题

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卡赞斯坦的名作《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即将面世。出版社和译者让我写几句话代为推荐。我很高兴接受这个“任务”，它不仅是由于自己与作者相识并从中受益良多，更因为相信这部作品能激发思考，值得一读。

有关这本书的大体内容和研究方法，李小华在“译者序”里已经做了介绍。我相信小华的译文是准确的，介绍也是值得一读的。他与原作者的相交，近一时期达到很高的频率，也为这部书的成功翻译打下了基础。图省事的读者，可以在阅读全书之前，先从小华的文字里做点预习；但无论如何，我希望读者能够抽些时间坐下来，从容地、静静地把这部作品从头读到尾。从我对作者及这本书的了解看，很难用一个特定的角度，或者简单的几句话，将这本书的特点，一览无遗地概括出来。表面上看，它是对战后日本警察和军人自我认知之变化的一种探讨，是一个专题性、国别性的“case study”，但我认为，它包含的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创新，远远超过了有关战后日本同类作品，甚至大大胜于通常我们见到的国际关系书籍。从专业研究者的广泛兴趣讲，你当然可以说它具有典型的建构理论特色，你也可以说它将“文化”范畴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重新做了诠释，你同样不妨说它反映出当代战略和安全研究的一种新趋势，你甚至能够说它是对机

构式的经验主义的深刻否定，或者专门从方法论角度衡量，将它说成是对传统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学新的研究范式的某种综合；所有这一切，以及在此来不及一一提及的其他概括，取决于读者的关注点和知识结构，取决于它的赞成者或反对者想要获取的东西。它亦有缺点和矛盾的一面，有不少作者自己也感到不确定、没把握的地方，比如李小华指出的那样（尤其是日本现有的体制、认同感与军国主义复活前景之间可能的联系），然而即使是这些地方的评价分析（包括李小华的评语），我想也是可以争辩和探讨的，它们毕竟没有定论（除官方的一些说法），缺乏足够成熟的分析和历史经验的证明。卡赞斯坦作品的意义，包括亦将在中国出版的另一本名作《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认同》（1996年英文版），不在于它们给出的这样那样具体的材料、数字和观点，而在于它们提醒告诫人们，不要为一些流行的定论或所谓的“先见之明”禁锢和迷惑了我们的头脑；任何事物都有可能从不同视角透视，依照时代的真实变化和理论的有力解析，这种多层次的观察与思考有助于避免简单化的结论。对于中国的读者，特别是研究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的有心人，我想这一意义是重要的；我们需要学习、借鉴，争取做得更好。

在《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和自卫队》出版之际，写这么几句，权作为中文版的引言。

王逸舟

2001年12月12日

译者的话 国家安全研究的文化视角

据英国学者曼戈尔德（Peter Mangold）的考证，“国家安全”的现代用法最早出现在美国报纸专栏作家李普曼 1943 年的著作《美国外交政策》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个提法才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常用的标准概念。在国际学术界，关于安全，特别是关于国家安全的研究方法，一直是有争论的。争论的主体可分为三个流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其着眼点分别是权力平衡、制度设计和文化规范。自 80 年代后期以来，前两个流派又被统称为理性主义，这样，当前安全研究中交锋的双方就表现为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对峙。而后的发轫与成长，是与一位国际关系理论大师——彼得·J. 卡赞斯坦教授（Peter J. Katzenstein）的名字是分不开的。

一、彼得·卡赞斯坦教授与国家安全研究中的文化视角

彼得·卡赞斯坦教授系美国康奈尔大学政府系小卡朋特讲席国际研究教授（Walter S. Carpenter, Jr.,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同时在众多学术团体，如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研究协会、大学教授协会担任重要职务，还曾任著名的国际关系杂志

《国际组织》的主编。卡赞斯坦教授先生多才多艺，精通德、法、拉丁、希腊等多门外语。1973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自此发表了大量极富震撼力的作品，如：《世界市场中的小国家》、《国家安全文化：世界政治中的文化与认同》，以在国际关系理论、比较政治学、地区研究等方面，特别是因开创了国家安全研究中的文化视角而蜚声国际关系理论界，与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芬·克雷斯勒（Stephen Krasner）和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并称为“三K”。1998年，在著名的国际关系“旗舰”杂志《国际组织》50周年之际，“三K”合作，以卡赞斯坦教授为第一作者，写了一篇长文：《国际组织50年：世界政治中的探索与争鸣》，成了20世纪90年代末三派对话的经典之作，一俟发表，便产生了广泛的反响。本书为在国际关系学界有着很高学术地位的康乃尔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丛书的一个主干书目。一出版就获得广泛好评，被认为是提供了一种“多年来在国家安全政策和行为方面最有意义的一种研究方法”，“一本十分重要的著作，不仅是日本问题专家需要仔细研读，而且也是东亚安全事务专家，乃至所有对安全决策程序感兴趣的学者们案头必备之作。”

二、文化、规范、认同与国家安全研究

本书是以对以往国家安全研究范式的批判开始理论整合的，并在其后的行文中，以日本在二战后50年来所发生的内外变化为例，特别是以日本的警察和自卫队在角色与认同上的转换作为分析的主线，来佐证其论点。全书理论视角新颖，案例选择精到，且二者结合浑然天成，在安全理论与日本问题研究方面，都堪称经典之作。在笔者看来，本书最大的学术贡献与特色在于以

下三点：一是创立了一个新的概念体系，如“规范”、“文化”、“认同”等，这是全书理论的基点；二是对既有国家安全研究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解释法的批判，这是全书逻辑的起点；三是力图弥合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之间的界限，并把二者纳入一个统一分析框架的努力，这是本书理论上的最大尝试，也是安全研究中最亟待突破的难关。

“规范”（norm）是本书的核心概念，按卡赞斯坦教授的定义，“规范”为有着特定认同的行为者的适当行为描绘了一个共同的期望。不同的规范起作用的方式也不同。本书仔细辨析了两种规范。规则性规范（regulatory norms）涉及确定合适行为的标准，进而塑造政治行为体的利益，协调它们的行为。例如，在当代日本，它就表现为警察和军队都承认的社会存在：安全政策只能由和平的方式来实现。构成性规范（Constitutive norms）表明了行为体的认同，也规定行为体的利益。

“文化”（culture）是由各种不同的规范和认同构成的，它受习俗和法律的承载，作为一个宽泛的标签，表示民族国家权力与认同的集体模式。它们在不同的政治领域具有不同的作用。通过政治活动，规范被反复地创造和再创造。“认同”（identity）的概念则是一个简洁的标签，用来描述行为者、民族和国家的建构过程。在本书里，“集体认同”与“规范”的概念是相同的。

政治利益由规则性规范和构成性规范共同确定。例如，在日本的外部世界安全观中将军事目标置于经济与政治考虑之后的作法，有组织国家暴力在日本外交实践中的相对次要地位都是规则性规范，它们源于日本的国家组织结构。集体认同规范也可以塑造政治利益。自60年代以后，绝大多数日本公众将追求经济繁荣看作是日本的集体认同。自民党的多数派和日本政府强行压制政治反对派的意愿，如它们提出修改和平宪法和警察活动原则的要求。这些都强化了协商性，而非简单多数原则的政治程序这

一构成性规范，成为确立适当政治行为标准的参考。

在卡赞斯坦教授看来，现实主义是安全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分析视角。但这一理论有两个重大的缺陷：一是它对日本安全政策的分析结论是不确定的；二是它将国家看作是单一和理性的行为体，而日本不是。国际体系内权力分配格局的变化并没有导致日本国家安全政策的重大变化。更重要的是，现实主义是如此的宽泛，以致于不同的人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一些人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对日本的安全政策只有极小的影响力，另一些人则持相反的看法。我们可以同意一些常识性的概念，即国际环境为国家的行为设置了外部约束，规定了国家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但无法运用这种一般性的结论来对某一特定国家的安全政策做出深入的分析。

当然，卡赞斯坦教授也部分地同意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即把国家看作是一个理性、单一的行为体，有着固定的偏好，如生存需求。这是一个经过仔细挑选的，有严格前提条件的假定。这在一些极端情况或战争时期或许适用。但由于战争是一项社会工程，即使在战争时期这种假定也不能完全得到满足。而且内部安全常常在国家安全与个人安全间出现根本的冲突：很多旨在保障国家安全的政治行为损害了公民的个人安全。本书对现实主义的一个核心假定——国家安全是一项公共财物，并不会在国内政治中产生冲突——提出了置疑。

自由主义指出了规范（自由主义称之为偏好）的重要性，但它只重视已经成形的规范，却忽略了规范的建构的过程，而恰恰是后者，规定了行为体的认同与利益。自由主义把个体的动机与社会存在联为一体。从这个观点看，自由主义对规范的分析对文化解释论的批评最为典型。第一，文化分析法太过宽泛。例如，儒家伦理就不能深入地解释日本的低犯罪率。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各地犯罪率都普遍上升。如果说儒家伦理是日本社

会秩序的主要原因，那么中国和韩国的犯罪率应该更低。但实际并非如此。第二，与个体持有的价值不同，规范是集体财产，它们实际上由不同的个体拥有，并形成了一种客观存在，反过来对个体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相反，文化解释论常常假定行为是由个体持有的价值决定的。

20世纪随着大批脆弱的国家创建合法性努力的展开，内部安全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并有着重要的国际影响。但由于现实主义将国家当成单一行为体，将内部安全当成国内政治专家的分析范围。这就将国家安全跨领域的研究方法给割裂了。与现实主义的方法不同，卡赞斯坦教授认为，可以将日本安全的国际方面与国内方面放在一个分析框架内加以分析，这样才能理解日本安全政策的独特之处。在卡赞斯坦教授看来，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区别，并不在于是权力的分散还是集中，而是涉及界定、解释与重新解释不同规范的人的数量与制度化程度有多高。在国际社会，这传统上是属于少数国际法学者的任务。这些学者也会向他们各处的国家政府通报国际社会规范的演化进程。

国内规范对国际变量的意义何在？在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里，可通过平行或相似的国内法规，或通过国际条约来形成一致的规范。条约可具体地勾勒出规范的内容，当这些规范转化为国内法规时，就具有了约束力。反过来，它们也可对普遍原则加以说明，正是这些原则为规范提供了环境。全球层次上的社会规范给国家规定了集体认同与权威的标准模式，如有关公民身份与人权的地区性或全球性意识形态。国家在国际环境与组织性和专业性的各种体系中运作，而后者不但体现着，也修正着它们所生存的国际环境。然而，正在出现的国际层次的政治体制制度化程度并没有国内政治体制那么高。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卡赞斯坦教授提出了自己的分析范式，他声称力图避免现实主义和传统文化解释法的缺陷，前者否

认文化的重要性，后者过分强调社会中规范的固定性，也超越了自由主义解释法的范畴，它完全建立在规则性规范之上。这些视角都企图得出一个有关行为的普遍法则，狭义地假定存在着一个最好的方法，能将政策和政治组织起来。本书研究的核心是已成为国家制度一部分的规范。因为认同规范常常是富有争议性的，也常常有内在矛盾，因而它们影响由它们所决定的利益。日本的安全政策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三、文化视角的理论定位与经验证明

卡赞斯坦教授在书中坦陈：“本书只是提供了一个国家安全的分析视角，而不是一项关于国家安全的理论。非要找出这样一项理论，我觉得还是不成熟的，因为我们还处于摸索阶段，来试图发展出一套理论上谨严、又得到经验支持的研究项目。在社会学中，我们过多地探讨经济理性主义和社会制度主义是一种不谦虚的表现。但本书力图指出，在国家安全问题的分析方法中，结构主义与理性主义同社会学视角之间极端地不平衡。”以此观之，本书无疑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为冷战后已走过了全盛期的安全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作为一项研究视角，文化规范分析法的确提供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分析范式。只要在能经得起理论与逻辑的检验，就足可在理论界据一席之地。但其解释功能如何，我们可验之于两个案例：一是本书的分析对象日本，一是卡赞斯坦教授本人运用文化规范分析法对新近“9·11”事件的评论。

卡赞斯坦教授认为，日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警告我们，如果不认识到这一变革，“不仅是犯了一个严重的知识错误，也会失去创造东亚稳定与和平的政治良机。”

这的确是发人深省的警言。因为即使是从现实主义的视角看，日本想要重建军备，也属不易。据卡赞斯坦教授估计，如果日本试图建立与其经济实力和人口数量相称的常规军队，则其付出的代价意味着日本需要至少连续10年每年花费1500亿到2000亿美元（远远超过德国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统一时所付出的代价）。即使对日本而言，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数目。

但他同时也认为，现在的日本与邻国和平共处，它自身也处于和平状态之中，军事扩张的欲望已被抑制住了。中国不能成为“历史的囚徒”，没有必要根据日本经济军事实力不断增长的事实，就推断出它会回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军事扩张道路上去。而且作者把这种观点看作是一种“错误的政治期望和偏颇的政治解释”。这似乎很难为现在日本的表现，特别是小泉上台以来的表现所证实。

即使以卡赞斯坦教授所称的“构成性规范”来看，日本的内外行为规范历史也难以支撑上述论点。日本著名学者猪口孝先生曾说过，一部日本的近代史，就是三对外交政策理念的交锋史，即：小日本主义与大日本主义、国际主义与亚洲主义、民生国家与普通国家。随着这三种理念的此消彼长，日本的对外行为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通观日本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近一百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投降，日本走过了一条不断以军事力量为手段向中国和朝鲜为主的亚洲国家扩张的道路。这一历史轨迹似乎很能说明发展和扩充军事力量、依仗武力对外扩张是日本近代国际政治思想史上惟一的国际政治理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近代日本思想史上，还存在着一条与其相对抗的国际政治理念的脉络。尽管它与重视军事扩张的思想相比一直处于弱势，但确实存在并且与其平行贯穿于日本近代历史当中。这一脉络的核心是基于和平通商贸易的国际政治理念。事实上，这两种理念在日本近代的历史上曾出现过

两次交锋，日本对外政策的战略性选择也因此有过两次重大的机遇。

第一次是在 19 世纪中期（从幕末到明治初期的一段时期）。这一时期，虽然日本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摆脱了长达二百多年的闭关锁国体制，整个社会达成了对以西方列强为主导的国际社会开放的共识，并确立了积极融入这一国际体系的战略方针，但是在如何融入国际社会、如何看待国际社会的结构和运行机制方面，日本却曾存在着追求军事霸权和重视通商贸易的两种国际政治理念的对立。这两种对立的国际政治理念的源头分别可以追溯到幕末时期的思想家佐久间象山（1811—1869）和横井小楠（1809—1869）。最终，前一种理念占了上风，从而导致后来日本吞并琉球、侵占台湾，挑起中日甲午战争，并在 20 世纪初经日俄战争后吞并朝鲜，推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扩张主义政策。

日本经历的第二次对外政策的战略抉择发生在 20 世纪 20 年代。这一时期，经过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已跻身成为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一员，其推动近代化的各种措施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日本的资产阶级随着近代化的进程和工业的发展迅速成长起来，他们重视日本在对外贸易和经济方面的利益，能够比较自觉地意识到日本在世界中的地位，在要求国内政治民主化的同时，在对外政策方面也提出并支持日本的国际协调战略，成为支持这一战略的社会基础。然而，延续了横井小楠和平通商贸易的国际政治理念的思想在第二次战略选择中又遭到了冷落，其结果就是二战的爆发。

实际上，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所确立的“贸易立国”的发展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横井小楠的国际政治理念在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对外政策的原则。然而，鉴于日本历史上战略取向的变化教训，国际社会，特别是其邻国，怎么能够彻底相信历史不会重演呢？

另外，“9·11”之后，卡赞斯坦教授在一次讨论会中，提出了同与会其它专家，包括基欧汉不同的见解。认为用“战争”来定义这场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并不准确，还不如用“警察加情报”来界定可能更贴近现实。外交、结盟、军事斗争固然很重要，但绝不是全部。实践也证明，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恐怖主义是不会持久的。但这次情况则完全不同，敌人就在美国内部。它们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以一种松散的、单元形态分布的存在方式发展着。以日本和德国的经验来看，铲除这样的恐怖主义组织至少需要一代人的努力。美国现在面临的形势可能更严峻，因为恐怖主义有着遍布全球的触角，而且存在于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内部。美国人不得不要问，一个国家能最终战胜自己么？在“他们的”阿拉伯人杀害“我们的”阿拉伯人的时候，用一次“战争”来概括全面么？

卡赞斯坦教授也承认，文化视角并不同要推翻权力与利益视角，而是要补充、修正这一分析路径。他不同意亨廷顿的观点，把文化当作决定一切的力量，仅仅根据所谓的中国向中东某些敏感国家出口武器，就臆造出一个想象中的“儒教——伊斯兰教联盟”，作为西方世界的对立面。在卡赞斯坦教授看来，“中国向美国出口‘耐克’鞋的意义也许远远大于向巴基斯坦出口导弹的意义”。中国的行为，是不断发展的经济、官僚体制、文化建构的共同产物，而不是单一的国家实力增长的结果。对美国而言，这次事件不啻是一次机会，即摒弃美国例外论的余调，向欧洲同行所提倡的“社会不安全”（societal insecurity）和亚洲同行所提出的“综合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概念学习。恐怖主义不仅是国家权力的竞争对手，也是国家权力的一个寄生物。其论如何，读者自可鉴别。

最后，我要把自己的感激与敬意献给那些在翻译过程中曾给予我诸多帮助与关怀的先生们与女士们，他们是：我的导师、中

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教授，没有他的关怀与指导，本书中译本的面世是不可想象的；我的学友陈志远博士、孔颖小姐、庞文刚先生、杨宝荣先生、陈洪桥先生，他（她）们的友谊与热忱，是本书得以顺利完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保证。

李小华

2001年12月10日

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

中文版序言

就在半个世纪以前，一个曾是世界强国之一的国家衰落了，军队战败，城市毁坏，社会机构不能正常运转，人民生活无望。这个国家将一切都放进了一场危险的，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最高权力的赌注之中。该国的军事侵略使数百万人丧生。它的行为给人类的良知以及它自己的历史抹了黑。后继者们将为他们的父辈犯下的罄竹难书的罪行而背上重负。

半个世纪以后，这个国家与邻国和平共处，它自身也处于和平状态之中。军事扩张的欲望已被抑制住了，城市在重建，邻国不再惧怕它。可以肯定，该国有一些人，包括老人和年轻人，仍然很怀念过去的军事力量和浓烈的国家精神。这些期望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在一个尊重言论自由、鼓励辩论、容忍异议的民主国家中。尽管这个国家离完美的标准还很远——并不是指个人和社区——但它在安全文化方面已经经历了一个彻底的变革。我是在描述德国——生我养我的地方，尽管现在我是一位美国公民，但研究德国已有几十年了。

日本并非德国。但是在一个关键点上将两国相比较是合适的。正如历史所显示的那样，两国在战争中遭到失败、领土长期被占领，这两点得出了一个结论：安全文化，就像更普遍的文化一样，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文化是随着环境、机构中的领导者和

公民抉择的改变而改变，而这些抉择总是需要自己的政治逻辑。对我而言，就像中国所作的那样，没有必要根据日本经济军事实力不断增长的事实，就推断出它会回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军事扩张道路上去。同样，讨论日本一意孤行的想拥有核武器，以此作为所谓的无政府世界中的最低保障，这样的问题也同样缺乏说服力。日本通过一个军事安全同盟和一个安全共同体与美国绑在了一起，又通过不断增强的经济联系与亚太的合作伙伴们相互依存。日本的生活经验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有联系的社区。半个世纪以来积累的证据要求我们祛除错误的政治期望和偏颇的政治解释。

由于安全文化不是不可改变的，改变环境和不同的选择可能——尽管不可行的成分比较大——会在将来创造出这样一个日本：许多人有不合理的恐惧心理或者对日本崛起的预期自 50 年代初就产生了错误的预计。但是创造不创造文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如果影响较快，会导致日本政体的动荡，这个动荡如此之大，以至于邻国会有机会决定他们的政治立场，并且准备应对一个奉行强硬政策的日本。

但是我们应怎样分析一国安全政策的文化层面呢？^① 简单来讲，本书就国家利益提出了疑问，国家安全的主流解释通常被想当然化了。例如，在没有明显的地缘战略和经济利益的情况下，为什么一些强国在本世纪 90 年代的利益，而不是在 30 年代或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的利益，使他们愿意以武力介入来保护其他国家公民的生命和福利？为什么在冷战后期，苏联认为从东欧事务中撤出是它自己的利益所在，而关于此事，它以前曾拒绝过很多次。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确定，但是很重要。国家利益不是因自

^①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